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 當前兩岸關係

作者 / 劉振與

提
要

兩岸長期分裂主要及肇因於意識型態上的對立，甚至進入全球化時代之際，兩岸在政治上的互動仍是「無解」。尤其面對中共國力不斷的崛起，勢將更為壓縮我生存發展空間，若長此以往，未來兩岸發展恐將不易出現和平曙光，此一結果絕非兩岸中國人之福。當前兩關係出現「政冷經熱」弔詭現象，然經濟發展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支柱，亦是永續發展之基礎，然而並未因經濟的熱絡而改變政治上的對立。針此，本文試圖從全球治理的觀點，檢視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兩岸關係如何跳脫意識型態的「零合遊戲」之桎梏，從全球化的觀點，以全球治理之理念，尋求兩岸大中華經濟圈最大利益，以及兩岸在和平安全的架構下發展，構建兩岸互利共贏的最大公約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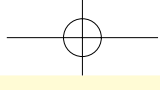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關鍵詞：全球化、全球治理、意識型態、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政治社會化、兩岸關係。

壹、前言

2005年3月14日中共10屆全國「人大」及「政協」第三次會議通過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審酌中共制訂該法，使兩岸的交流互動再度陷入僵局。觀察中共並無立即動武的跡象與急迫性，反而是對台進行統戰的最佳時機。因為中共可一面拿起棍棒，一面丟出胡蘿蔔。如春節包機、水果入陸等議題，中共更搶得詮釋權，藉此扮演拿著橄欖枝的和平使者；甚至以高規格陣式接受在野黨黨主席訪問大陸，即是對兩岸關係採取先發制人之策略。

對兩岸關係的研判上之所以可能「誤

判」，可歸因於研究敵情的角度上受對過去窠臼的限制：當無法跳脫出國共內戰或是兩岸對峙時期的情緒，亦或是沈湎於「中國/台灣」之對立意識，刻意「醜化」中共為萬惡不赦的共產黨，或將中共「美化」為國防、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進而「矮化」自己僅剩下悲情，只能消極的向國際間尋求同情與支持。這種刻意塑造一個敵人作為政治議題操弄，或是內部情節之凝聚都失之偏狹。對世局變遷，應可試著以較為宏觀及理性的角度審視，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觀點，耙梳出不同的觀點與見解。



貳、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制約因素

一、全球治理與兩岸關係

當前兩岸關係之研究偏重於「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之分析，但隨著國際環境及內部因素的改變，國家已非個人或政黨及國家機器所能雙手左右。^①隨著全球化思潮方興未艾，地球村的觀念盛行，國家界線的藩籬逐漸被打破，由國家壟斷統治資源及主權至上的傳統觀念思維已逐漸動搖，因而全球治理的新思維因而興起。雖然至今國際間仍將兩岸關係定位於「分裂國家」之列，^②但事實上，兩岸關係除了因意識型態在主權問題上不斷角力之外，其他方面卻出現一「動態」的活絡現象。與其如此，若兩岸均能體認全球化浪潮之不可逆性，進而思考全球治理的可能性，或許能為當前的兩岸關係，產出創意之思維，使兩岸能永續發展，共謀福祉。

面對中共積極致力於睦鄰外交政策及區域性合作機制之建立，加上全球化環境下國

家利益結構的根本變化，^③確可重思兩岸關係之定位。一般而言，「全球治理」的觀念首先來自Rosenau將國家治理視為一種共同目標支持的活動，而主導活動之主體卻又未必是以國家機器所行使，此乃透過一種未必是強制的行為所實現共同目標的共識結果。

^④換言之，「治理」(governance)並非政府所獨享，而需集全球政府與非政府之力共同努力方可有效解決爭議。^⑤由此可知，當國家主權式微及邊界可滲透性增加，公共政策的制訂內容逐漸模糊之際，因為必須結合更多的共識與外在因素及考量國際環境，政策才能制訂完成。絕對的主權與外在因素過去了。國家固然仍為唯一完整主體，但真正影響全球互動者，絕非國家而已。^⑥

學者指出，運用「全球治理」之概念檢視兩岸關係之互動，期望能以全球的觀點，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及共同利益之結合，省思21世紀的整個中國（中華民族）。^⑦在此一概念下，超越主權、意識型態之桎梏，建立兩岸的世界觀，增進彼此人民福祉。換

①：此一論點詳見耿曙、陳陸輝，「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2卷第6期，（92年11、12月），頁20。

②：張亞中，兩岸主權論，（台北：揚智出版社，1998年3月），頁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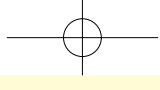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③：朱蓓蓓，「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46卷第6期，（92年11、12月），頁100。

④：Rosenau, J, N, and E, Czempiel, 1992,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⑤：張亞中，「論兩岸政治」，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2卷第6期，（92年11、12月），頁100。

⑥：張亞中，全球治理：主權與權力的解析，參閱網址：[http://iir.nccu.edu.tw/isc/pdf/40-4\(p1%7e24\).pdf](http://iir.nccu.edu.tw/isc/pdf/40-4(p1%7e24).pdf)

⑦：詹中原，全球治理趨勢下兩岸交流互動關係之探討，參閱網址：<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13lagxyth/657315.htm>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當前兩岸關係

言之，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及全球治理的架構中，針對「一中」原則，思索更寬廣之道路，如此才能維護兩岸真正的生存空間。^⑧況且兩岸關係之網絡結構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亦屬全球網絡之一的環節，必然受到擴大的多邊主義情境所制約。^⑨如此一來，國家或以主權不因是唯一認同對象或憑藉，因此兩岸關係問題之解決不以國家為中心，而是透過國家、市民社會及個人共同參與之治理格局為槓桿，承認多元存在，^⑩更重要的，藉由「全球治理」的觀念，審度兩岸關係之前景與發展，跨越現有之統獨論述及思考，^⑪共謀兩岸發展之最大公約數。

審視當前兩岸的對立局勢並未有所緩和，相對的，中共正以更為積極、彈性、靈活的作為步步進逼，如開放台灣水果入陸等，這些固然帶有統戰的目的，但是若故步自封，一味以政治與意識型態的角度思考兩岸問題，任何面向均以中共「為敵不足為友」之狹隘觀念，缺乏全球化與「全球治

理」之宏觀格局，未來恐將於兩岸問題及國際關係上，無法走出具體性之空間。如此一來，中共的「統戰」真的成為我們的制約因素，^⑫甚至是一個沒有配套措施的國家安全機制為緩衝而失去商機。^⑬

二、當前兩岸關係的制約因素

以當前台灣地區的人口結構而言，基本上屬於外來人口移動所組成，目前台灣地區居民的祖先主要在1683年至1860年間來自福建泉州、漳州的「福佬人」，及廣東潮州、惠州、嘉應的「客家人」為主。^⑭1949年出現最大的一次遷徙，^⑮這種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人口遷徙，即是種下日後台灣地區內部族群對立的主因。因而有學者指出，國內最嚴重的政治問題便是基於省籍情結所衍生的統獨爭議，而這種族群的衝突是政客基於自身理念與立場所點燃的。^⑯

平心而論，「二二八」的發生牽涉層面甚廣，最早可回溯至滿清時期「中日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使台

⑧：曹俊漢，全球治理趨勢，爭取國際生存空間。參閱網址：<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LA-C-090-185.htm>

⑨：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揚智出版社，2002年11月），頁171、175。

⑩：李英明，前揭書，頁188。

⑪：張亞中，「論兩岸治理」前引文，頁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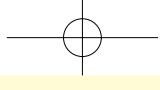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⑫：楊開煌，「統戰是台灣的單門」，中國時報（台北），94年8月13日，A4版。

⑬：張顯超，『兩岸『三通』的開放調整與協調，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46卷第6期，（92年11、12月），頁24。

⑭：段昌國等編著，現代化與近代中國的變遷，（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90年8月），頁288。

⑮：當時約有一百萬大陸各省分人士來台，詳見Heywood, Andrew原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Politics）（重譯本），（台北：韋伯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80。

⑯：同註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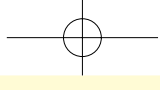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灣成為日本附庸，因而被日本統治50年，從此台灣與中國大陸切斷了在政治上的統屬關係。其次，1945年日本侵華期間，日方為能在大陸進行非法活動或從事軍事侵略，因而利用台灣同胞協助其工作，此等均造成兩岸民眾認知及歸屬感出現對立。此外，「七七事變」後，日人強徵台灣同胞隨日軍作惡，使大陸同胞仇視台灣同胞，台灣同胞在淪陷區經商者，光復後仍被大陸同胞視為其有資敵之罪，因而沒收其財產，族群對立心結乃形成，而這些因素都是埋下日後「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地區內部統獨情節的根源。^⑮再者，台灣光復前，國民政府鑑於台灣地區所處環境特殊，未恢復省制反而採用行政長官制，使行政長官擁有軍事與民政指揮權，此與台灣同胞認為光復後，可與中國內部各省享同等待遇之希望落空。^⑯加上當時的行政長官在接收台灣之初傳出弊端，經濟政策更未見成效而人心不滿，對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的作為，由期待轉為落空，進而心生失望而反感，最後導致爆發「二二八事件」。

當前國內政治人物僅因政治立場的對立而消費「二二八」，故過去的傷痛未因時間的流逝而逐漸彌平，反而有深化內部不同族群間的裂痕與不信任感。相對而言，由於當前執政黨在意識型態上屬於「獨立」光譜之一端，與當前中國大陸希望兩岸「統一」之期盼相衝突，致使兩岸關係呈現較為緊繃局勢，尤其因為選舉關係而不斷製造新的政治口號與議題，作為不同族群內部支持者凝聚向心的憑藉，如「入聯公投」即為適例。過去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型態被視為較傾向「統一」的一方，但為了選票，亦不得不提出前述相同之議題，故造成中共內部對泛國民黨未來的兩岸政策出現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兩岸雖在經濟上有高度的共通性與互利關係，但是在政治上卻未曾有共識，彼此之意識型態上正好位居光譜左右兩個極端。因此，若從國家主權的觀念出發，勢必無法體認「合者兩利，分則兩害」之意義。^⑰兩岸人民在血緣、語言與文化的同質性，及經濟依存互賴之利害關係，必須超越政治、主權等意識

^⑮：段昌國等編著，前揭書，頁340-341。

^⑯：當時的行政長官為陳儀，雖然陳儀在受降典禮後宣布在台施政方針，台灣同胞故對其寄予厚望，但實際上接收人員對日人所留下的工廠、業務缺乏運作能力，長官公署繼續啓用日人在台工作，讓台灣同胞懷疑政府施政誠意。且陳儀在經濟上實施專賣政策，唯所賣物品質劣價昂又供應不足，而設立之貿易局則壟斷海內外市場，台灣商人生機受到扼殺，加上陳儀不顧日人統治台灣50年的事實，在民國35年1月舉行全省漢奸總檢舉，讓當時台灣中產階級人人自危，失業人口日增，經濟紊亂，官民間缺乏意見交流，各報刊遂多批評之詞，台灣同胞對政府信心乃日漸喪失，由期望轉為失望，至民國36年乃爆發官民衝突的「二二八事件」。向請參閱段昌國等編著，前揭書，頁190-191。

^⑰：本次所述「分」、「合」之意，並非指政治上「統一」或「獨立」之意，而是各種形式的合作。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當前兩岸關係

型態的枷鎖，以全球治理之觀念，尋求互利共贏之途。如同學者所言，只有超越民族主義，才能超越對立。超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必定就是全球主義。所謂全球主義，就是支持，而不是抗拒，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轉的人類歷史發展主流方向，也是不可抗拒的人類歷史發展的主流力量。^{②①}全球化下國族界線與框架日漸模糊，此即全球治理理念得以萌芽之際，兩岸若能掌握此潮流，才能創造區域發展的契機。

三、理性認同^{②①}與兩岸關係的互動

統獨問題是造成國內公共政策議題共識基礎薄弱的主因，因為在兩個對立的意識型態上，最後因妥協後所制訂的政策已脫離現狀甚遠。當然，在兩岸問題上，呈現出的差距更大，爭議更為激烈。嚴格說來，統獨問題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政治社會爭辯最激烈、影響最廣泛的問題。所謂的「統獨問題」，受爭議的是台灣究竟是否要宣佈獨立進而與中國大陸的主權糾葛，還是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使台灣與大陸再度統一。^{②②}事

實上，統與獨均為光譜之兩端，唯有建立彼此共識，才不會自我設限。

兩岸分裂分治不得簡化為單一法統主權問題，兩岸因台灣海峽造成地理上的隔離並沒有因同根同源的血脈相傳而試圖弭隔閡。兩岸除了意識型態上的差異外，血統、文化、語言、宗教等具有高度同質性，但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識型態對立，卻才是阻礙兩岸發展的致命傷。兩岸領導人若先放下意識型態的桎梏，從建構全球治理的角度出發，以非國家、政府組織型態處理兩岸問題，或有和平曙光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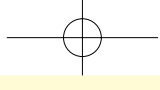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誠如江宜樺的分析，「統獨問題」的議題是關係到台灣是否要與中國大陸切斷主權糾葛而另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現實法理層面之問題；而「國家認同」的問題則論及何為國家認同？為何要有國家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何在？一個人的國家認同能否改變的哲學性的思考面向？^{②③}雖然有學者認為，這種爭議性的問題是因為台灣邁向政治民主化出奇的「副作用」、「陣痛期」，或許這是因

②①：以全球主義作為兩岸出路，參閱網址：<http://udn.com/NEWS/OPINION/XI/2174950.shtml>

②②：有關對國家認同的相關界定，學者蕭高彥從政治哲學的面向分析指出其為公民對於時深處的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此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為共同生活而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險時願意犧牲自我。詳細論述內容可參閱蕭高彥所著，「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省思」，石元康等著，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8月）頁108。

②③：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出版社，2000年4月），頁1。

②④：江宜樺，前揭書，頁137。另外，學者對國家認同所產生的爭議及該議題內涵應包含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等三個層面，相關內容論述可參閱江宜樺所著，「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石元康等著，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8月），頁108。



為剛萌芽的民主化造成言論自由的開放，加上思維更加多元化，對台灣定位問題亦開始論辯所致。²⁴然事實上，從近年來的幾次選舉過程中發現，此一議題便不斷被炒作，內部的分裂加深，制約了兩岸關係正常發展。

由是觀之，以當前兩岸關係之發展，無論是統獨問題或是國家認同問題，均無法有較為理性的運作模式，自從2000年之後，兩岸關係出現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就台灣內部而言，深怕被大陸「併吞」，而大陸方面則深怕台灣推動台獨，兩岸關係確有漸行漸遠之跡。平心而論，中共官方執意忽略台灣亦在崛起的意識，而這種以台灣為主體意識的思想，勢必成為為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因為有關國內對主體性的定義內涵，是以抗拒中國大陸為主軸，以生命共同體口號為核心的主權訴求。在中共方面，主體意識的鞏固係憑藉民族主義為號召，控制分離傾向為重點的「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台灣而言，主體性的訴求乃表現為內在淨化的運動與排外的氛圍，此與中國大陸動輒反應在向外征服的衝動與封鎖的行為有所差異。²⁵

從全球治理的理念觀之，兩岸關係之發展雙方領導人均須認同一個事實，即必

須從解決政治人物間的對抗心結為起點，改變以怨恨為取向的社會心理治療方法，而用博愛為前提的集體心態，作為兩岸政治菁英追求主體改變的途徑，當然，此或許觸及對立已久的政治領導風格，但卻是兩岸關係正面發展的為一契機。²⁶或許兩岸領導人均存在「權力資源是有限的，當對方權力資源增加時，就意味著自己的權力資源減少」之誤解。²⁷政治上一旦過於強調主權問題，兩岸關係變成為一個客體或工具，但在兩岸交流互動頻繁的民間團體眼中，一旦強調主權問題便不存在兩岸關係，這也是為何政府一再呼籲「戒急用忍」，甚至祭出各種殺手戩，仍擋不住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熱潮，這種「官冷民熱」的現象形成一種極弔詭的畫面。此即認同的混淆雖然政府缺乏可遵循的制度，但民間社會自主運作能力得以發揮，當政治掉入捉摸不定的口號中，民間則自主性的找出得以掩護自己行動的正當性，儼然成為現代版的「一國兩制」。²⁸因為在民間團體眼中，兩岸關係是跨越主權的層次議題，用主權切割之後的兩岸關係，與名符其實的民間團體毫無相關，用主權來切割原本聯繫的兩岸關係更是無法產生規範效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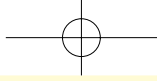
²⁴：黃藹，「民主的弔詭-對台灣邁向民主化的省思」，哲學雜誌，第18期，（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07。

²⁵：石之瑜，創意的兩岸關係，（台北：揚智出版社，1997年11月），頁77。

²⁶：同前註。

²⁷：石之瑜，「對政治權利的心理分析途徑」，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11月），頁209-210。

²⁸：石之瑜，兩岸關係概論，（台北：揚智出版社，1998年7月），頁91-92。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當前兩岸關係

②⑨這種現象兩岸領導人早已心知肚明，然而，兩岸關係至今依然無解，甚至波動起伏劇烈，或許驗證了譚謙的觀察，這種「堅決鬥爭，絕不妥協」的心理，自古潛在中國人心中一種「贏者全贏（全拿），輸者皆輸」（win all take）的政治「零和遊戲」（zero sum of game theory），這是將最高政治權利視為一種單一的、不能分割的、且是戰無不勝的全能力量（omnipotence of power），而這種鬥爭形式與思想根源，是中國數千年來歷史流毒最深、遺害最大的傳統思維。③⑩因此，爲了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雙方唯有捐棄成見，以新的思維與國家定位，共同擘畫兩岸的發展藍圖。

四、民族情節因素的兩岸關係

學者指出，兩岸關係的關鍵乃在大陸民族主義方面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滿足，而中國大陸之所以如此重視民族情緒的發展，主要是期能形塑內部團結鞏固與共識之取得，尤其在鄧小平高舉經濟改革的大纛下，講求實事求是，造成中共內部意識型態的鬆弛，甚至引發「姓社姓資」的立場對立衝突，鄧小平最後只得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口號親自定調，強調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性，以「不改革就下台」的呼籲平息此爭論。鄧小平所謂的「中國特色」事實上就只

是鄧小平的個人特色，③⑪因爲只有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定案的人，那怕當鄧小平將所有職務交出後，其個人權威仍高於當時的領導人，以致於江澤民在鄧後權力穩固之際，便積極提倡個人的意識型態教育——「三個代表」，更施展鋪天蓋地的全民運動。從此一角度觀察，此乃一種內部啓動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機制，藉此凝聚內部民氣，避免民衆有思想認知上的混淆，且能轉移社會主義信仰力量的淡薄，穩固政治領導人掌握大局，俾能一致對外，尋求發展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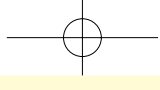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結果，中共官方意識型態逐漸褪色，相對而言，無論是中共領導威權方面或是共產黨的控制能力都出現弱化現象，在講求高度人治色彩及黨國機器控制之社會主義國家中，面臨這種權威衰退的窘境，甚至地方派系與人民主導意識的提高，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都是一件無法



②⑨：石之瑜，創意的兩岸關係，（台北：揚智出版社，1997年11月），頁11。

③⑩：譚謙，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61-262。

③⑪：有關此一概念可參閱石之瑜著，創意的兩岸關係，（台北：揚智出版社，1997年11月），頁192。



見容的是，加上台灣地區進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共擔心可能內部將出現「和平演變」之效應，民族主義必定再度成為中共領導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圖騰。

中共不顧台灣民意的強烈反對與國際間的強力譴責，最後仍執意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其用意便是先用民族主義的力量塑造了內部的民意基礎，一旦通過此法後，又可強化內部「反台獨」的聲浪，這種「一石二鳥」的戰略手段，時值得吾人關切。

中共當局必能瞭解到玩弄民族主義猶如刀之兩刃，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火上身，然而在中共官方的謹慎操作之下，雖然手段上稍有緩和，但態度上絲毫未見鬆軟。然中共真正的目的係基於國家安全與地緣戰略之考量，因為中共認為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與50年代美國推動的「圍堵政策」不謀而合，中共擔心美國的「單邊主義」將會對準中共。³²積極與鄰國加強經貿、外交往來，建立戰略伙伴關係，意圖建構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地位，在國際上取得與美國相抗衡的戰略優勢，這也是為何中共領導人多次出國訪問及參加國際性活動的目的，其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五、傳統的迷思與意識型態的兩岸關係

兩岸交流固然存在著許多變動的因素，但從1949年以來，因意識型態的差異造成的隔閡最大。意識型態是一種讓人民瞭解社會角色與定位的符號系統，因此，學者進一步分析，意識型態可看成是一套能提領社會大眾從事具體的行動綱領或步驟，以便引導社會大眾從事具體社會實踐之符號系統。因此，任何一套「意識型態」最大特徵乃在於其對「理論與實踐」一致性的強調。

33 中共的意識型態意涵係指由當權者所支持之路線思想，此一路線思想除了反映當權者個人與派系的利益與世界觀外，更企圖挑起社會大眾的歷史意識，進而引導其依照某些綱領步驟從事社會實踐，以便達到當權者所欲達到之目標。³⁴綜上可知，實施社會主義的共產國家特別重視意識型態之運用，而自由民主社會，雖然意識型態逐漸淡化，事實上並未完全絕跡，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或執政黨，無不以其可動員之資源進行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教育形塑功能，³⁵以達到政治化的目標，最終促進民眾支持政府與政黨的政策，獲致執政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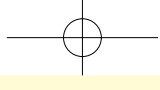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就台灣地區而言，早期在國民黨統治

32：林和立，「北京反日意在美國」，參閱網址：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niland/can_2005_04_14_01_10_30_893html。

33：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出版公司，民國86年3月），頁51-52。

34：李英明，前揭書，頁78。

35：一般而言，政治社會化是人們透過學習及社會經驗「獲取」其政治態度之過程。或將政治社會化視為個人獲取政治信念及價值的過程，此過程乃是將上一代的價值及態度傳遞給下一代。參閱楊日青等譯，前揭書，頁318。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當前兩岸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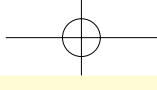
的時期，強調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意識型態之主要訴求，更將此作為各階層政治社會化的基本素材，此種意識型態的教育，在面對與中國共產黨鬥爭的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功效，使得中國國民黨能持續在台灣地區執政長達50餘年，這種穩定發展造成台灣現今各項成功經驗之基礎，使得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因經濟的成長進而促進政治的發展，讓中共未越雷池一步。然而，隨著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結果，這種黨國式的意識型態環境，隨著政府推動開放黨禁、報禁與言論的自由而銷解，甚至出現反威權統治、反國民黨及「反蔣」的街頭社會運動，這種經由不斷的社會運動對權威體制與國民黨控制的黨國機器衝撞的結果，造成其影響勢力逐漸衰退，控制的層面亦逐漸縮減，使得台灣內部意識型態意涵不再是政治社會化的主要訴求議題。其中最大的轉變，除不斷強調台灣主體意識之外，亦主張強化台灣本土意識的內涵，藉此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相抗衡。遂使「台獨意識」透過選舉的過程不斷被傳送出來，台獨意識的興起除了可與統治台灣50年的國民黨相競爭，亦能與中共霸權大聲說「不」，由其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成立之後，更是強烈主張台灣獨立的主體意識，從近幾年來的選舉過程中發現，民進黨中主張台獨的基本教義意識，基本上均保持著30%左右的穩定支持群眾，經過2000、2004年總統大選，以致於台灣內部的意識型態光譜，出現明顯藍綠對立的現象。

台灣內部的意識型態意涵存在著特殊的現象，因為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一種微妙與對立的關係，這種在血統、文化、歷史傳承上並無法與大陸相區隔，但在意識型態、地理與歷史條件上又難以融合下，使得兩岸關係一直存著高度的不確定因素。但是就雙方民間層面而言，卻因為不存在或較無在乎意識型態的箝制，因此交流互動頻繁，每年台商往返兩岸數百萬人次，且台灣每年與「中」、港、澳地區經貿往來不斷增加，台灣地區電視台介紹大陸風光、美食節目亦不計其數，然而受到官方意識型態的框架限制，兩岸關係不但未獲進展，更因為中共擔心陳水扁政府將台灣帶上獨立之路，不斷以各種方式強化其「一個中國」、「反台獨」的論調，絲毫未見其正視中華民國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更可見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性疑慮。

參、兩岸關係發展的蠡測

未來兩岸關係之走向，若能以「全球治理」之觀點，將兩岸意識型態兩極化之光





譜向中間移動，雙方致力尋求發展之解套方式，逐漸擺脫主權及國家框架束縛，形成華人社會的共同體，兩岸關係將大有可為，惟應注意以下幾個面向：

一、強化全民國防認知

當國內媒體及民衆的眼光都聚焦於《反分裂國家法》之際，往往忽略了定兩個更值得關切的法案：《國防動員法》、《緊急狀態法》。因為《反分裂國家法》賦予中共對「台獨」主動出擊的法源依據，更是侵犯我國的主權及現狀，將中華民國矮化為地方政府，將「台灣問題」視為其內政問題。但是《反分裂國家法》只是備而不用，事實上，以中共的思維邏輯而言，就算中共要打台灣，何需大費周章立法後才動武？但是《國防動員法》及《緊急狀態法》則是中共內部針對「緊急狀態」下的行動準據，而「緊急狀態」必然包含「意圖分裂國土」之選項，此時解放軍依據上述二法，便能出兵弭平戰亂，因此該二法是《反分裂國家法》的配套法案，更是行動方針，然而我們卻忽略了後二法才是讓兩岸關係陷入更為緊張的局面。³⁶面對中共的威脅，我們持了不斷強化國防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民衆必須建立健全的心防，因為從中外的戰例驗證了無形戰力的蓄積永遠勝過有形戰力的培養，一旦缺乏無形

戰力之鞏固，再強大的有形戰力均無法抵擋外來的侵略，二次大戰的波蘭、法國及波灣戰爭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殷鑑不遠，因此心防的鞏固，才是阻止中共武力犯台的最佳法寶。

二、以發展代替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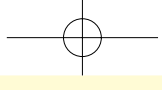
政治是公民在國家範圍內涉及公共領域的事物，更是政治人物為了追求權力、地位、利益所展開的競爭與決戰。因而，政治是涉及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重大事項。³⁷有媒體指稱，我們的政府並沒有所謂的「兩岸政策」？因為我們從事的是「中國/台灣」的對立，而後藉由不斷挑動這種對立，將其轉移成「統獨」、「賣台/愛台」、「外來中國人/本土台灣人」的撕裂與對立，最後靠這種撕裂來收割選票上的利益。³⁸如同學者李念祖所言，若兩岸要用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和平將不會成為任何一方的主要關切



³⁶：杜筱越，「反分裂國家法後的兇狠殺招，中共還要修《國防動員法》」，新新聞週刊（台北），2005年3月17日，頁32-33。

³⁷：洪鑣德，21世紀社會學，（台北：揚智出版社，1999年3月），頁221。

³⁸：新新聞社論，「別把撞牆當樂趣」，新新聞週刊（台北），2005年4月7日，頁11。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省思當前兩岸關係

（選項），反而會被認做示弱的表現，而和平必然難以成為民族主義的最終選擇。^{③9}

若兩岸能試圖從「全球治理」角度出發，重新省思兩岸關係之發展，正視當前兩岸民間互動的現實面，以建立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面向為基礎，將主權問題暫時擱置，走出兩岸當前政治困境，共同攜手尋求政治以外的「可替代方案」。面對當前嚴峻的兩岸關係，政府應該以更為宏觀的角度、更為開闊的政治格局，不放棄任何選項，只要是為了台灣的生存發展，均值得一試，因為只有走出去，才有發展的希望與空間。

三、積極開展市場，分散依賴風險

近年來由台灣地區與大陸投資經貿往來之數據來看，台灣地區的對外貿易出超金額有越來越向中國大陸傾斜之趨勢，^{④0}換言之，台灣在經濟發展上，反而有逐漸依存大陸之現象，政府的任何法令總是無法阻擋台商前往大陸投資的熱潮，畢竟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與廉價的勞力成本，加上語言、文化等方面幾乎無任何隔閡，此誠如大前研一所言，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台灣是最具

競爭力者，因為台灣有別人所欠缺的語言、文化等方面之優勢，因此兩岸若能共同攜手合作，未來必定創造更大的利基。^{④1}雖然如此，台灣地區的經貿發展若過渡依賴大陸市場，一旦中共官方實施緊縮政策，則台灣經濟發展可能將面臨重大的震盪，若台灣市場被中共掌控與主導，不但失去過去所建立起來的經濟優勢，恐將被中共市場及政府的黑洞吞噬，若中共「以商促（逼）統」，我們又如何因應以對？因此，如何廣伸觸角，多面向經營，「西向」、「南進」、歐陸市場，都是值得嘗試的地方，分散市場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除能分擔風險之外，亦是台灣經濟上尋求自主發展及走上國際化的契機。

四、多元靈活的思維與全球治理理念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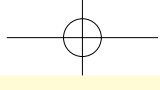
國內有關敵情研究至今已累計可觀的成果，研究者心中不自覺地以仇恨為立場，則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將形成盲點與偏見，此將使研究者在閱讀中共資訊時，只注意到所需要的證據來強化自己信心，最後研究結果將淪為意識型態之爭，^{④2}甚至先有結論再找證

③9：李念祖，「不要誤蹈民族主義的陷阱」，新新聞週刊（台北），2005年3月31日，頁38。

④0：根據經濟部2003年針對兩岸經貿所做的統計顯示，兩岸貿易額達406.6億美元，約佔台灣出口的25%，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328億美元，自大陸進口79.6億美元，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248.4億美元，而中共外經貿部統計兩岸貿易額為446.49億美元，增長38.%，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額為38063億美元，大陸對台灣出口額為65.86億美元，台灣順差314.77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地區最大順差來源地及最大出口市場。參閱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3年5月），頁6-68。

④1：詳請參閱大前研一原著，王德玲、蔣雪芬譯，看不見的新大陸：知識經濟的四大策略，（台北：下雜誌出版公司，2001年4月）。

④2：楊開煌，「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年11月），頁55,034。



據。但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中，研究者應具備更為多元、宏觀的思維及國際觀，尤其若能從全球治理的理念著手，思索兩岸暫時擱置政治及意識型態對立之可能性，進而尋求兩岸發展的最大公約數，並將相關研究成果提供決策者參考，而兩岸領導者意願亦從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與幸福著想，而非如何征服對方，獲得生存的詮釋權，甚而將統與獨之議題擱置，交由時間決定兩岸發展的走向，使當前兩岸敵意及對立氛圍能予以緩解，共創兩岸永續發展的空間，此將更能獲致多數民意之支持，而名留千秋。

肆、結論

自從兩岸開放交流以來，雙方雖然不再是「漢賊不兩立」，但是彼此間的政治鬥爭卻一直未曾中歇，其主軸便是在獲得兩岸關係發展中的「詮釋權」。因為一旦誰掌握了「詮釋權」便取得主動出擊的戰略優勢，因此，在兵戎止戈之際，雙方唯有塑造各種議題，意圖左右對方的兩岸政策，取得詮釋的主動態勢，更可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優先被認同與支持，然而議題的創造並非垂手可得，因為其中必定包含著政策意涵與戰略目標，例如過去喊出「一國兩制」、「江八點」；而我方亦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統綱領」、「李六條」、「兩國論」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及高度政治意涵的議題。

中共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就是再度拋出議題，因此對於中共意圖之研判，不

能就該法的表層意義為之，而應試圖更深入的挖掘其所隱藏的真正目的。因為該法通過前，中共動對台軍事攻擊行動，勢必立即成為國際事件，甚至驚動聯合國出面斡旋，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本為兩互不隸屬的主權獨立國家，然而《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後，雖然此刻國際間對中共此舉大都不表認同，但表達強烈抗議者或以行動杯葛者幾稀！若中共強烈運用媒體對外造勢，形成「謊話說一千遍變成真話」的事實塑造，國際間對於台海一旦爆發危機，因認為此乃「內政」問題恐將作壁上觀，依法不宜干涉，屆時我們的前景才真正的憂慮。因此，眼光必須放遠，格局必須擴大，拉長與中共的政治鬥爭的戰線，延伸對「主權」問題的詮釋，不將焦點僅置於台灣海峽上，而是要廣結善緣，從「全球治理」的觀點出發，放大至國際舞台上，將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成果推銷至國際上。藉著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使國際間分清楚兩岸的民主政治實施成效與對人權維護的決心，必然會站在屬於民主自由的這一方，如此才能創造有利我們生存發展的空間與條件。

作者簡介

劉振興

政戰學校政治博士；現為國防部參謀。